

紀念陳榮捷先生

鍾彩鈞*

陳榮捷先生在今年八月中旬與世長辭，其一生最大的勞績，當推其對中國哲學思想、典籍的介紹與英譯，以及對朱子縝密的研究。美國地區研究宋明理學的興盛，先生無疑地當居首功。

余生也晚，因時地之隔，本無親炙的機緣，然因工作關係，這兩三年卻有幸能拜望風采，聆聽一二教言。茲稍加追記，以表示我對先生風範的懷念。

民國七十九年八月，我應聘至本處工作。到任甫一週，吳宏一主任就拿了一封先生寄來的對我的博士論文的書評，囑我回信，並請求其同意發表。原來當初我以倫敦大學的博士論文《朱子天人觀的發展》為代表作申請進入本處，先生為本處設所學術諮詢委員，在諮詢委員會上見到拙作，就帶回美國去看，然後便寄來這篇書評。我花了兩小時匆匆回覆，對史實與翻譯的問題幾乎都接受，對朱子思想的解釋則略作回應。很快，先生又來信云：「愚讀台端博士論文，獨見殊多，來函解釋，亦言之成理。……拙文如能刊登，至為榮幸，未審來函亦可同時刊出否？二者均非應酬文字之比，而深有學術意味。」後來書評及我的覆函皆刊載於《中國文哲研究通訊》一卷一期。

拙作本不足道，值得記的是先生的風範。我想先生對研究朱子學的青年學者，有特別的關懷。鼓勵勸誘，無所不至，其中似有薪傳的苦心。先生對朱子的文獻極熟，其著作的特色是「徵實」。朱子的每一個哲學概念，先生必根據相關文獻，將其背景、來源、涵義、流衍，解說的十分清楚，而對朱子的出處、行實的考證也是先生的絕學。先生除了指出拙作的瑕疵外，更能啟發我的治學的態度。他以九十高齡逐頁逐字指陳拙作在概念、史實、翻譯上的缺失，而我卻只用兩小時來回答。原因

* 本處副研究員。

自是事實的考徵只能接受，真是「虛實之辨」的現成例子。我深深感到先生學術上的輝煌成就，背後實在有一種一絲不苟的態度與老而彌劬的精神做為基礎。

民國八十年五月三十日，先生來本處出席設所學術諮詢委員會議，我除了當研究生時曾聽過先生一場演講外，這是第一次接觸。聚餐時，先生說想和我聊天，要我餐後到他房間。我依約前往，他很親切地詢問我的背景，和我閒話家常。他說美國的朱子研究是他開始提倡的。約略記得先生的描述是這樣的。在二次大戰時，美國有一筆款項想用來支持中國哲學研究，主事者打電話問先生可以研究甚麼。先生說朱熹。主事者說：「甚麼？你說是誰？」先生重覆了幾遍，對方還是弄不清楚。當時美國只聽說中國有王陽明，還沒聽說有朱熹。先生因此感到有全面地譯介中國哲學的必要，這也是先生事業的一個機緣。

民國八十一年五月二十九日至六月一日，本處與中華文化復興總會合辦了「國際朱子學會議」，先生抱病擔任主題演講，為會議的成功作出最大的貢獻，也是其一生最後的學術活動。朱子學會議本來列在本處八十一年度工作計畫中，因為文化總會有意舉辦同樣的會議，所以雙方決定合作。合作後規模擴大了，也多了許多活動。但當時卻有了兩個變故，一是先生在元旦前後跌倒，住院了一段時間，以後身體狀況便差了；一是吳主任在春節之後罹患眼疾，三月開始請長假，處務由林慶彰兄代理。在這種情況下，籌備工作無法按部就班地進行，而是相當混亂的。很快地到開會的時候了，大概是朱子在天之靈的庇佑以及船到橋頭自然直的運氣吧，會議開得頗為成功。自然，文化總會的宣傳也是功不可沒，籌備工作的大小缺點，都被浩大的聲勢掩蓋了。先生是會議的靈魂人物，以下略述我所知的一些片段。

先生當時已九十二高齡，加上身體未全康復，家人都很耽心台北之行，但先生有堅強的意志，仍然不辭辛勞，萬里赴會。五月二十九日，開幕式後，先生坐在輪椅上發表主題演講〈論朱子觀書有感詩〉，我拿著麥克風侍立在側。第二天，同事拿著中國時報笑著對我說：「恭喜你上了頭版。」一看原來是先生演講的照片，我也玩笑說這是我事業的顛峰。先生當時已經有健忘的現象，常一再重覆先前說過的話，但對會議卻非常認真，會議進行期間，除了精神不濟回房休息外，一定照議程表挑選場次去聽（因為宣讀論文甚多，會議分兩會場進行）。我真切地感覺到先生對朱子是抱著信念與熱情的。我們治學可以有各種方向、內容與方法，但信念與熱情，永遠是一位真正學者的必要條件。

先生萬里辛苦赴會，促成會議成功，是我們深深感謝的，但我以為在先生一面，

能為朱子學作最後一次的貢獻，以及和老朋友相會，也是莫大的安慰。大規模的籌備工作因為進行的較晚，有些外國學者因不及準備而無法參加。我寫信給先生報告邀請的狀況，先生回函要我再次邀請美國的狄培瑞教授、日本的岡田武彥教授、德國的余蓓荷教授，云：「岡田武彥新年尚有賀片來，不應預不參加。余蓓荷曾遊武夷，不應缺乏興趣。」並抄錄地址，要我檢查有無寄錯，謂會議目的在鼓勵朱子研究，甚盼他們能來參加。我因此再度去信幾位教授，表達先生期盼之意。狄教授因是時在法國和家人有難得的聚會，岡田教授則剛自大陸調查陽明遺跡回來，年老需休養，皆無法赴會。余教授則答以雖系務繁忙，若允許她發表即將出版的有關南宋地方政治新著中的一章，則可以赴會。余教授來了以後，告訴我說，先生一直待她很好，因此先生希望她來，無論多忙也得來。在會議空隙裡，我告訴先生余教授這麼的有心，先生笑著說：「她每年都寄給我巧克力。」我問先生開不開心，先生說：「很開心，看到了許多老朋友。」余教授以外的許多老朋友，如中國社科院的蒙培元教授、福建師大的陳其芳教授、政治大學的曾春海教授等等，都常圍著先生聊天，特別是陳其芳教授和朱榮貴兄兩人對先生全程的陪伴照顧，最讓會議單位感謝。廈門大學的高令印教授在會議的最後一天才匆匆趕到，也來得及見到先生。先生返美後，健康愈衰，便不再出門，以至長逝。我想，台北之行對九十二歲的老人是非常辛苦的，對籌備會議的我們也是沈重的負擔，但這個會議事實上提供機會，讓先生對朱子作出最後貢獻，以及和老朋友最後相會，又使我們感到十分的欣慰。

我對先生的一點接觸和認識，都是透過朱子學的因緣。先生作為朱子學者的風範，永遠令我懷念，永遠值得我學習。